

# 孟治与民国时期的中美文化交流

陈倩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原纽约华美协进社社长孟治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国最早赴美的留学生之一, 为 20 世纪 20 年代至 60 年代的中美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遗憾的是, 这样一位至关重要的文化使者却被历史遗忘, 除了胡适等少数名人的随笔、回忆录、书信集中偶有提及, 他在文化史上几乎已然销声匿迹。根据华美协进社内部出版的孟治英文回忆录以及现藏于华美协进社、哥伦比亚大学等处的档案材料, 结合当时的新闻报道, 试从三个侧面揭示此人在民国时期中美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以及当时的民间文化机构在双边关系中的桥梁作用。

**关键词:** 孟治; 华美协进社; 民国; 中美关系;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0)06-0207-09

1967 年 4 月 20 日, 纽约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举行了一场简朴而隆重的退休晚宴。《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Henry R. Luce)之长子卢斯(Henry Luce III)致辞:“我祖父是在中国最伟大的美国传教士, 他则是在美国最伟大的中国文化传播教士。”<sup>[1](24)</sup>卢斯所言的“他”正是这场退休晚宴的主角、执掌华美协进社三十多年的前社长孟治。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和中美交流史上曾十分活跃的人物, 时至今日, 双方知识界均已将其淡忘。中国现代文化史对孟治的描述大多散见于胡适等人的日记、随笔、回忆录和书信集里, 已有的研究也基本集中在教育学领域。在美国, 除了华美协进社出版的孟治英文自传之外, 哈佛学生帕美特(Andrew Charles Parmet)1993 年完成的关于孟治对中美关系之贡献的本科学位论文(*Chih Meng and the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Pioneering Two-Way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Exchange, 1926—1949*), 是目前极少的

成体系的成果。但其篇幅有限, 且集中于孟治主持华美协进社期间美国社会各界对该社活动的评价。因此, 对孟治的关注似乎还远远不够。

## 一、从参与新文化运动到主持“中国之家”

孟家祖籍山东, 久居于京津两地。孟治是孟子的第 72 代孙, 1900 年出生在京南老宅“忠恕堂”里, 幼年在家族私塾接受四书五经的教育。因种种机缘, 这个传统世家走在了“新变”的前沿。孟治祖父读过严复所译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著作。孟治父亲原本倡导君主立宪, 后张勋、袁世凯复辟令其失望, 转而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 参与过武昌起义。其时, 他的天津故交严修、张伯苓从日本回来, 创办了南开学校, 他便把孟治送了进去。

**收稿日期:** 2019-06-01; **修回日期:** 2019-09-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华美协进社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关系研究”(18BWW016);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华美协进社与‘京派’文学”(16WXC024)

**作者简介:** 陈倩, 湖南长沙人, 文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外文化关系、海外中国学, 联系邮箱: qpeichen@126.com

严家和张家也是天津的名门望族。严修曾官至清政府内阁成员,在光绪帝维新变法失败后请辞退休,转办教育;张伯苓年轻时参加过海军,见证了中日甲午海战,深感中国的问题并非技术和军事上不如人,而是观念和制度跟不上时代。两人联手,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募得不少捐款。他们也引起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天津的代表盖利(Bob Gailey)的关注,后者极力劝说张伯苓访问美国。那时恰逢好时机,孙中山革命让美国人认为未来的中国将向美国模式靠拢,因此对中国格外开放。张伯苓对美国文化大有好感,回国后便聘请英文教师。于是,孟治在南开接受了中西合璧的教育。1916年毕业后,他考入清华深造。

1917年夏,刚刚在美国通过博士资格考的胡适回到北大,不久便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孟治听过胡适的几次课和演讲后,很欣赏后者身上那种英美自由知识分子的派头,视其为自己的榜样。1934年,在为胡适《四十自述》撰写的英文书评里,孟治仍盛赞胡适是个“不平凡的人”<sup>[2](93)</sup>。年轻的孟治不仅参与了胡适、刘半农等人发起的白话文运动及歌谣运动,收集、整理了大量民歌,而且在胡适的引荐下,结识了来华访问的杜威(John Dewey)和罗素(Bertrand Russell),并担任杜威的私人翻译。据孟治的自传回忆,他原本与胡适一样奉行文化革新而反对暴力参政。可是,1919年5月4日那天下午,他在形势无比混乱时被请愿的学生裹挟而卷入与警察的冲突中,并且作为学生领袖之一,同其他5人一起被捕下狱<sup>[3](87)</sup>。

孟治的这本英文自传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隔着时间和空间回看中国现代史,不免会掺入他对那段往事的“后见之明”。事实上,从“改良”到“革命”,孟治当时的内心或许远比起其自述更为微妙。1918年,清华大学与“基督教青年会”在京郊卧佛寺联合举办过一个夏令营。一方面,这个机会让他对基督教和西方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另一方面,热血青年凑到一起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五四”恰好为他们提供了契机。夏令营的营友当中有好几位后来成为五四

运动“敢死队”的成员,孟治亦为其一<sup>[3](80)</sup>。无论他出于“无意”还是“有心”,经唐德刚考证,胡适当时并不赞同这群“毛头小伙”的做法,觉得五四运动是对他和一批朋友——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正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罗家伦把宣言一贴,傅斯年大旗一摇,孟治坐起牢来……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sup>[4](49-50)</sup>胡适教授也当不成了,被迫回到纽约“落草”。不久后,孟治亦赴美留学。他们并未料到,日后还能在美国经营一项共同的事业——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

1919年,孟治在清华大学毕业典礼上获得5年的留学资助,赴美顺理成章。与诸多怀揣“美国梦”而踏上西行“取经”之路的学子不同,孟治更希望把儒家的“大同”理想普及到大洋彼岸去。临行前,他的朋友、在山东传教多年的美国人老卢斯(Henry W. Luce,卢斯家族第一代)甚至为他取了个教名——保罗(Paul);父亲的战友孙中山也在上海家中会见了,嘱咐年轻人在海外要牢记自己的中国文化之根。8月,孟治与其他14名清华学子一起,由教员林语堂带队,经过16天的航行,终于抵达美利坚。

最初,孟治自愿去从未有过中国学生的北卡罗来纳州戴维森学院(Davidson College)就读。两年后,他又来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拜投到杜威门下,并遇到同在哥大的胡适和张彭春等人。在此,孟治感受到了纽约各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坚定了向西方宣传中国的雄心。比如,1921年夏天,孟治获得一份勤工俭学的兼职,美国女诗人伊文斯(Mabel Lorenz Ives)对中国古典诗歌很着迷,经人引荐找到他帮助阅读中国诗。孟治在哥大的老师、人类学家鲍厄斯(Franz Boas)正在从事比较文化研究,十分关注中国,当他得知孟治是孟子后人,也同他结为忘年交。

与此同时,孟治很快成为“基督教青年会”的骨干,还加入了美国“中国学生联盟”(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和“北美中国学生天主教协会”(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1923年至1924年,他先后当选为拥

有两千多名会员的“北美中国学生天主教协会”主席以及“世界外国学生联谊会”(International Foreign Students Friendly Relations Committee)顾问委员会的秘书长。他在美国华人知识圈中的威望日增，也受到美国宗教界和教育界大佬们的青睐。1927年，孟治于哥大毕业前夕，收到好几份工作邀请。第一份邀请来自“北美中国学生天主教协会”，希望孟治能为他们全职工作；第二份邀请由南开校长张伯苓和清华校长梅贻琦发出，他们催促孟治回国开设关于国际事务的课程；刚成立不久的“华美协进社”正缺一位有能力的执行主席，他们亦看中了孟治。

最初，孟治倾向于第二份工作，张伯苓和梅贻琦都是他尊敬的老师，报效祖国也是他矢志不移的信念。慎重起见，孟治在中国和欧洲短期游学、考察，最终决定接受华美协进社的邀请。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时处极不稳定的内乱期，帝国列强虎视眈眈。孟治认为让更多西方人了解而不是妖魔化中国比向中国的少数精英分子介绍西方更有价值。另外，当时的华美协进社也很需要一位得力的领导者。

华美协进社成立于1926年5月25日，由美国思想家杜威、教育家孟禄(Paul Monroe)和中国学者胡适、郭秉文等人共同创办。他们最初以“中国基金会”(China Foundation)的名义申请到庚子赔款的部分返款，即每年25 000美元，连续三年，作为华美协进社的创建资金。该社刚成立不久便在费城召开的国际博览会上举办了中国教育展。首任社长郭秉文也在各大城市巡回演讲，向美国民众推介中国文化。华美协进社在西方迅速引起关注，1926年12月19日《时代》的专门报道称其为非政府的、非盈利的双边文化交流机构，卓有成效地在美国“介绍了中国知识和文化的核心观念”<sup>[5]</sup>。

孟治毕业后于1928年正式进入华美协进社。不久，郭秉文回国任职。在胡适、杜威等人的力荐下，孟治于1930年正式接管该社，成为它的第二任也是迄今为止任期最长的社长。在他的领导下，华美协进社的业务逐渐拓展，知名度也越来越大，但没有固定场地成为限制其发展的最大阻碍。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富豪们

自顾不暇，谁愿意为宣传中国文化出力呢？1943年寒冬，孟治试着求助于他的出生在中国山东的老朋友、华美协进社董事会主要成员亨利·卢斯(Henry R. Luce)，后者热情邀约他在“时代-生活”(Time-Life)大楼的私人餐厅会面。亨利看着孟治的眼睛说：“我猜你可能跟我一样，因为过于劳累患有黄疸病。快把黄疸病治好，我们好一起去看房子。”<sup>[3][192]</sup>他们后来共同相中了位于纽约上城区东65街125号的一幢小红楼。这对于华美协进社的历史来说是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因为它在这幢小红楼里待了整整一个甲子，直至2015年迁至下城区的Rector街40号。美国各界人士亲切地称之为“中国之家”(China House)。

如果说“中国之家”成为无数美国华裔学子在异国的“故乡”，那么孟治则扮演着这个大家庭“族长”的角色，为不少在美华人解决了实际困难。比如，天津名宿严修之孙、出身于南开话剧团的戏剧家严仁颖年轻时便因创作并演出多部话剧而成为天津卫的名人。1941年开始，他担任《大公报》驻美特派记者，为战时中美增进了解做出了贡献。1947年9月，《大公报》将严仁颖旅美期间撰写的通讯结集出版，名为《旅美鳞爪》，张伯苓题写书名，引起广泛反响。1945年10月，严仁颖奉命回国，主持天津《大公报》的复刊工作。至1948年9月，深感时局不稳的严仁颖辞去《大公报》职务，返美与家人团聚。生活在物价昂贵的纽约，严仁颖迫于生计为各种小报撰写稿件，在一些话剧、电视剧中客串小角色，日子万分艰辛。幸得老校友孟治的邀请，严仁颖到华美协进社工作，才算有了固定的收入。再如，翁同龢的五世孙、艺术收藏家翁万戈1938年留学美国，最初攻读电机专业。尽管他毕业后成为一名电机工程师，但深受家族熏陶的他无法适应终日与机器打交道的生活，却又苦于无法找到一份新的职业。那时他和很多纽约地区的留学生一样，闲时喜欢待在华美协进社。于是，他和孟治结识了，后者建议他去学电影。翁万戈接受了孟治的建议，并在他的举荐下获得了一项私人基金会的赞助，成为美国第一个学习电影的中国学生。他一直致力于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并于1980年代担任过华美协进社社长<sup>[6][13]</sup>。

## 二、解决经费危机与组织梅兰芳访美

1928年孟治毕业后进入华美协进社,参与了不少该社早期的重大事务。比如,1928年9月,他协助杜威、孟禄、达根(Stephen P. Duggan)对华美协进社进行改组,试图将其从“中国基金会”的直属组织变成一个独立机构。1929年底,由他牵头成立了一个由各界精英组成的顾问团,帮助该社出谋划策。这个顾问团反映出双边的特色,中美背景的人员差不多各占一半。孟治又发起成立了董事会,孟禄当选为第一届主席。到1930年1月,华美协进社的改组基本完成,成为一个独立的“会员制”机构。

最大的挑战是经费问题。上文已述,华美协进社的创建资金来源于庚子赔款的部分返款。到1929年前后,该社的后续拨款断绝,面临严峻的财政困难。孟治刚接手的那段时间,华美协进社只有两名非固定的工作人员,银行存款余额只剩下137.27美元。如果算上670美元应该支付的欠款,它的资产实际上已为负数。孟治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己的影响力和私人关系去募款。他的两位好友墨雷(W. Murray)和姚昌复(C.F. Yau)雪中送炭。前者是华尔街著名的保险经纪人,其女格蕾丝(Grace Murray Hopper)为美国最杰出的计算机科学家之一,Cobol语言的发明者。后者则在巴黎、纽约、伦敦多地创办了通运(Tong Ying)公司,担任总经理六十余年,一直是华美协进社的主要赞助商和董事会成员。姚昌复不仅在西方商界、政界树大根深,还作为中国文物鉴定专家,著述颇丰,在海外收藏品领域知名度很高,终生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

尽管如此,仅靠私人捐赠终非长久之计,何况1929年前后美国正遭遇经济危机,学术界、文化界普遍资金匮乏。孟治意识到只有当美国民众愿意自掏腰包为中国文化买单时,华美协进社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此时恰逢梅兰芳希望赴海外宣传京剧,于是,孟治觉得契机来了。

对于梅兰芳20世纪30年代初的美国之行,国内艺术史家往往只道齐如山和张彭春之功,极

少提及孟治以及华美协进社那段窘迫的往事实为重要的促成动因。从前期筹备,包括预订场地、设计演出线路、剧目翻译、制作宣传册等,到商演过程中向全社会推广、发起捐款、承担各项杂务,再到演出结束后举办答谢酒会、结集成册等,华美协进社担负起了承办方的角色。

1928年1月,孟治飞回北平,与梅兰芳、张彭春、齐如山会面,商讨梅兰芳赴美的具体事宜。那时华美协进社的经费还没有完全断绝,剧团的准备工作也并未完备,因此,赴美的想法既定,很多细节却没有谈妥。1929年初,解决华美协进社的经费问题已刻不容缓。孟治与梅兰芳频频联络,并且利用自己在美国的人脉,为巡回演出作铺垫。1929年8月,孟治接到张彭春和梅兰芳的信,他们希望在中国农历马年的年初(1930年2月)赴美演出。按中国的传统习俗,这意味着“马到成功”。但是,孟治认真咨询了百老汇的专业人士,他们的一致意见是最好安排在1930年9月至1931年5月期间,因为此前百老汇的剧场已大多被预订。

孟治将信息反馈回国内,但是北平方面十分坚持,一定要在2月演出。最后张彭春给孟治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明定下这个日子的原因:“梅不能理解我们为何无法为他找个合适的演出地点。在中国,他可以在任何时候要求到任何地点演出。而且日本人愿意在这个时间出5万美元邀请他赴日演出。不仅如此,上海和北京两地甚至已经为他举行了送别宴会,算命先生说1930年2月对于他来说是黄道吉日,此间赴美演出一定可以旗开得胜……”<sup>[3](151-152)]</sup>尽管孟治的自传没有再详细描述他后来如何与百老汇的“经理”就时间和场地问题讨价还价,但从张彭春极力劝说孟治的语气,以及他信中所使用的“我们”二字,基本可以推测,张彭春当年并没有绕开华美协进社,而很可能是通过孟治出面与百老汇最终谈妥演出的。

1930年初,梅兰芳剧团终于成行。2月16日,在纽约百老汇49街剧院首演。演出获得了超乎意料的成功:预计演两周的戏票,在开演第三天就销售一空,每张原价3.85美元,黑市炒到18美元。在观众一再要求下,共演了5周。之后,

梅兰芳又在旧金山、芝加哥、洛杉矶等地演出，历时半年，所到之处万人空巷<sup>[7]</sup>。就连梅兰芳本人也没有想到会取得如此效果。从1930年1月至7月，《纽约时报》共刊载了21篇关于此次访美的文章或评论，其评论员艾金森(J. Brooks Atkinson)在赞扬这次旅行演出的积极文化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华美协进社的作用<sup>[8]</sup>。

梅兰芳此行功成志满，还结识了不少美国文化名流，这些人大多都是华美协进社成员或座上宾。因此，在策演方华美协进社的告别晚宴上，梅兰芳深情地称自己来美的目的是“通过这一方舞台，促进美中之间的更亲密和更具耐心的双边了解”<sup>[9]</sup>，这一宏愿与华美协进社“镕华铸美”的设想高度契合。

正如学界已注意到的，梅兰芳访美并不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且西方人此前从来没有正式接触过京剧，商演面临着失败的风险。再者，“新文化运动”之后，国内不少人对某些古典艺术形式持否定态度，要对它们进行全面改造。在这种“内外交困”的背景下，梅兰芳访美的巨大成功是多种因素偶合的结果：西方人眼中中国戏曲的“现代性”元素、梅兰芳男扮女装的独特魅力、张彭春等人对京剧的成功改造、美国各界华人的大力帮助……我们发现，不少为梅兰芳访美出力的是华美协进社的“圈内人”。比如在梅兰芳行前便为其出谋划策的胡适，为张彭春创造便利条件的张伯苓，将演出剧目改编翻译成英文的姚昌复，编纂了《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The Pacific Coast Tour of Mei Lang-Fang*, 1930)和《梅兰芳·中国戏剧》(*Mei Lan-Fang Chinese Drama*, 1929)两部英文专集的莫伊(Ernest K. Moy)<sup>[10](62)</sup>以及参与为梅兰芳剧团捐款、为首演致欢迎词并多次在台下“捧场”的杜威<sup>[11](14)</sup>。总之，这次访美演出成为华美协进社早期最重要的活动之一。留美博士、华美协进社早年的秘书欧阳审(Eugene Shen, 音译)在记述华美协进社创立初期重大事件的英文编著《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31)中，花了很大篇幅强调该社在此次活动中的关键作用<sup>[12](7)</sup>。

无论如何，这场文化盛事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孟治达到了通过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而唤起美国民众支持华美协进社的目的。随着知名度剧增，经费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一位女士甚至当即捐出祖传的4枚金币。1930年底，孟治也终于招聘到一位固定的秘书润顿(Virginia Runton)，她为华美协进社工作30多年，直至1965年退休。至1943年，华美协进社仅管理的奖学金就已达250万美元<sup>[3](156)</sup>。

梅兰芳推动了美国人对中国古典戏曲和音乐的热爱。1930年2月，恰逢梅兰芳访美的同时，华美协进社在美国率先开设关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系统课程，包括对中国古典戏曲的介绍。不久，应美国各界强烈要求，孟治组织了一次中国古乐器演奏会，总共10首经典曲目，演奏者都是在美华人。乐队中有月琴、古筝、笙、箫、二胡、琵琶等，孟治本人演奏三弦琴(班卓琴)，他在演出开场前还向美国观众介绍了中国古代音乐体系。这次演奏会可算是第一次中国乐器的大亮相。《纽约时报》对它有高度评价。音乐家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作为观众深受震动，事后专门邀请孟治去他家中深谈，并坚信中国古乐可以为西方现代音乐开拓新视野。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受孟治的邀请，张彭春先后在华美协进社做过题为“中国的戏剧”<sup>[13](8)</sup>、“中国的剧场”<sup>[14](11)</sup>等多场报告。

### 三、作为抗战时期的中方代言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背景下，中美关系空前发展。除了陈纳德、陈香梅、宋美龄等众所周知的外交使者之外，孟治也是当时在美国为中国抗战摇旗呐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力图让美国政府和民众认识到日本征服世界的野心以及中国艰苦抗战的民族气节，他为提醒美国结束观望并积极加入太平洋战争而不遗余力。

1932年，美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了日本人河上清的《中日冲突之日方说法》(*Japan Speaks-On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河上清向美国人鼓吹中国社会的落后、愚昧，指责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能力管理这个国家，强调日本曾在庚

子之乱后积极奔走,避免中国遭到瓜分之祸。他搬出“特殊权益说”,将1904年日俄战争说成是日本为中国保全东北而战。为了表明当时中立国的立场,美方决定寻找一位中方代表予以回应,目光最终锁定在孟治身上。同年,麦克米兰公司又发表了孟治的《中日冲突之中国说法》(*China Speaks-On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此书指出,日本所谓“保护”与“开发”东北的实质是军事和经济侵略,南满铁路即是其重要工具,“没有比认为南满铁道公司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机构更大错特错的想法了”。早在1909年底,日本与俄国抵制美国国务卿诺克斯提出的《满蒙铁路中立化方案》时,就已充分暴露了日本独霸东三省的野心<sup>[15](73)</sup>。

二者针锋相对,虽皆出自民间人士笔下,却受到中日两国官方的重视。日本首相犬养毅和中国驻美公使、驻国联代表团首席代表颜惠庆分别为两书写序。《中日冲突之中国说法》出版后,从《太平洋事务》等期刊的书评来看,美国对日本独霸世界的野心尚无充分的警惕,它在中日之间摇摆不定。经历过“拳匪”之乱,大多数不明就里甚至对中国存在偏见的美国人似乎更倾向于相信日本学者的观点,对孟治的书提出了直白的质疑<sup>[16](582-584)</sup>。

这些质疑使孟治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无知的可怕。他在随后的几年里写了大量文章,也做过不下百场演讲。他的流利英语加上机智辩才有相当的说服力,美国人由此了解到中国民族自决的必要以及增进中美关系可能为美国带来的巨大利益。比如,孟治在《1937年的中国》(*China in 1937*)、《日本侵华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Japan's War o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美国对新的国际秩序之贡献》(*American Contribution to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等文章里宣扬中国的发展原本已向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体系靠拢,但是这个进程被日本人打断了。孟治在试图为中国抗战寻求西方世界的同情<sup>[17](134-135)</sup>。1937年,他取得哈蒙基金会(Harmon Foundation)的支持,拍摄关于中国国情、发展变革的纪录片,代表作如《现代中国一瞥》(*Glimpse of Modern China*)<sup>[11](86)</sup>。这些努力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

国的中国形象之转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美在40年代初能够进入所谓“蜜月期”,或许直接源于美国加入太平洋战场,但以孟治为代表的在美中国学生、学者的积极宣传也功不可没。胡适曾称赞孟治在西方为祖国嘶声呐喊的赤子之心,他在给孟治的信中说:“你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值得我们人民尊敬和感激。”<sup>[11](80)</sup>

在充满硝烟的二战期间,华美协进社成为美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在那一时期的华美协进社简报中,不仅有与中国抗战相关的各种新闻、信息,还有在美优秀华人的事迹介绍。为了加强在美宣传中国的力度,孟治十分重视与其他中美文化交流机构的合作,争取最广泛的资源,不断扩大“中国之家”的影响力。比如,刚入华美协进社不久,孟治便结识了医学博士胡美(Edward H. Hume)。此人是耶鲁大学“雅礼协会”(Yale-China Institute)的早期领导者,他曾在湖南长沙创办了雅礼(湘雅)医院、雅礼学堂,也是现代中美关系史上功绩卓著的人物。胡美从长沙回美国后,孟治成功说服他加入华美协进社,并成为了董事会的秘书长<sup>[18](61)</sup>。

孟治还曾邀请大量的中国学者、艺术家及西方汉学家到华美协进社讲学。继梅兰芳、张彭春等人之后,冯友兰、赵元任、赛珍珠、史沫特莱、老舍、林语堂等大批文化名人陆续到访,林语堂甚至成为华美协进社顾问委员会的常委。这些活动旨在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

在孟治的努力下,华美协进社不仅成为民国时期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实际上也扮演了中美政治合作的牵线人。它为美国政界、军界提供政策咨询。1932年至1933年,华美协进社的新闻署回应了美国41个州有关中国问题的书面疑问。此外,它还接受了大量的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关于中国问题的电话咨询。它多次支持、策划中国的中国学生反战运动,印制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宣传册并向公众免费发放。孟治还邀请中国政界人士访美,让更多美国人了解中国的现实国情。他本人在此期间兼任主持、记者、发言人等多重身份。比如,为宣传中国抗战,孟治采访了罗斯福总统夫人(Anna Eleanor Roosevelt)。后者对中国抗战十分支持,她极具说服力的身份对美国民众

有极大的引导作用。再如，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大地》(*Good Earth*)于1931年出版后，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源于此作，多有偏颇。赛珍珠笔下的中国是传统宗法制社会，美国的亲日派总以此来证明中国的落后和衰败。赛珍珠无奈于西方人曲解原作的意图，却又不便为自己辩解，特意邀请好友孟治一同出席阿斯托亚(Waldorf-Astoria)全美文艺界联合会，通过他告诉美国人不要断章取义，抹杀作者对中国社会正面评价的基调，更不能把小说创作当作历史真实<sup>[3](160)</sup>。

战争使得孟治对自己肩负之使命有了更深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早在1930年2月，华美协进社已开设中国文化与历史课程，授课对象主要是美国中小学教师，学费只有5美元。尽管几乎是免费的，但由于纽约市教育局不给予华美协进社认证的资格，愿意前来学习的教师十分有限，每期均不超过10人。1933年，孟治利用他的私人关系，通过许芹家族安排了与纽约市长拉瓜迪亚(Fiorello H. LaGuardia)的会面(孟治在哥大读书时，结识了华裔传教士许芹，该家族一百多年来致力于中美交流。他们的长子Irving Huie与拉瓜迪亚是好友)。没想到拉瓜迪亚当场致电教育局，便促成了此事。从此，华美协进社开设的教育培训班(Programs for Educators)取得学分认证资格，一直延续至今。而在1931年，华美协进社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学院合作，在纽约和新泽西州被选出的公立学校中推进探索性的中文学习项目。此后，汉学研究也逐渐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这种格局在40年代之后更为明朗。因华美协进社在孟治任上打下的中文教学的良好基础，2006年，中国国家汉办在该社建立了孔子学院，华美协进社从此成为海外唯一一家不依托于外方高校而独立拥有孔子学院的民间文化机构。

可见，孟治为促进民国时期的中美教育交流起到过重要作用。直至1930年，中美政府仍没有正规、长效的资助学生赴外留学政策。许多学生自费出国留学，还有些是由基督教组织资助，另外有一些凭借优异学业而获得本校或外方学校的奖学金出国留学。孟治代表华美协进社提出，中美政府和教育界应当建立相关的留学资助

项目，引起社会热议。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华美协进社设有“留美学生战时计划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Wartime Planning for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主任由梅贻琦担任，委员包括陈立夫、胡适、郭秉文等。这个委员会主要负责留美学生、学者的奖学金管理。在1937年至1946年间，它管理的奖学金涉及884名中国留学生。40年代，华美协进社甚至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向热衷学习中国文化的美国人颁发奖学金。该项奖学金持续资助1至3年，每年大约1500美元<sup>[19]</sup>。到40年代末，华美协进社促进中美民间教育合作和文化交流的努力已广为人知，中美两国官方的力量也陆续加入其中。

#### 四、余论

尽管孟治所做的似乎只是些默默无闻的琐碎工作，但他充当了民国时期中美知识界信息沟通与事务往来的“中转站”。比如，周作人曾与胡适交好，两人喜互赠打油诗，后因政见不同而渐行渐远。北平沦陷后，被指为“汉奸”的周作人曾遭暗杀，劫后余生的周作人作诗一首并附上硬朗朗朗站在八道湾居所前拍摄的照片寄给胡适。彼时胡适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常用“胡安定”的笔名，周作人便署了此名。结果信寄到大使馆后，谁也不认识这位“胡安定”，无从投递。幸得孟治知其底细，一年多后才由他转交给胡适<sup>[20](2-5)</sup>。再比如，在40年代的回国潮中，钱学森主要通过孟治与清华联系。在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创立者庄前鼎1941年5月3日给钱学森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梅校长：1、钱学森君聘任委员会前年已通过，请即航函或电报邀请。2、购书款请即通知华美协进社孟治先生查照办理。”<sup>[21](1877)</sup>此处的购书款是指清华委托钱学森选购带回国的文献资料。同样，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拟增设语言人类学系，冯友兰想请赵元任回国任教。其信中云：“抗战胜利后国内各大学竞谋扩充，清华文学院亦计划于下学年添开语言人类学系，拟恳先生返校，及济之、方桂诸公主持此系。籍老成硕望，俾清华之学术地位得以提高。国内狂简不知所裁，想先生久居异国，

必亦浩然有归志也。附上清华正式聘书,旅费由孟治先生处转致,望惠然肯来,益又不仅清华之幸也……”<sup>[22]</sup>

中外交流史上,曾活跃着众多文化使者。出于各种原因,他们中的有些人被历史记住,如利玛窦、严复、费正清,而更多的人却被淡忘。当被淡忘的人和事逐渐浮出水面,我们将几成碎片的过往史料拼凑起来,会发现是如此的丰富:其中毫不相干的部分竟可能有着极其紧密的关联;看起来水到渠成的事件背后实际上有着不为人知的万般因缘。将他们发掘出来,有助我们更多维地理解历史发展的动因和轨迹。

孟治正是这样一位跨时代、跨文化、联结政学商各界的被忽略的文化使者。他出生于世族大家,受过良好的教育,原本亦可耕耘一片自己的园地。然而,他大多时候甘愿居于幕后,如同诸多默默无闻的文化“传教士”那样,很少著书立说,从而逐渐消失在学术史的视野里。事实上,他是二战时期中方的重要发言人,推动了如梅兰芳访美在内的一系列中美文化盛事,为美国的华人建立了一个“中国之家”。他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一代甚至两代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知识精英层)的中国观,并成为民国时期中美教育合作、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见证人之一。他长期领导的华美协进社这一民间机构,也成为促进中外关系的桥梁和典范。

作为孟子的后人,孟治自然深谙儒家三不朽中“立德”“立言”易,“立功”则难的道理。在那个战乱频仍甚或铁幕阻隔的时期,很多知识分子不得不选择独善其身,孟治仍以一己之力游走于庙堂与民间,融合不同意识形态和文明传统,更显不易。他的英文自传的最后,以一个耐人寻味的中文单词结束:“大同”。这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也是他毕生奉献的志业。

#### 参考文献:

- [1] PARMET A C. Chih Meng and the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Pioneering two-way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exchange, 1926 — 1949[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 [2] MENG Chih. Review on autobiography at forty by Hu Shih[J]. Pacific Affairs, 1934(1): 90-93.
- [3] MENG Chih. 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A sixty-year search[M].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81.
- [4] 唐德刚.《刍议》再议[C]//书缘与人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91: 49-50.  
TANG Degang. Re-discussion on *A Rustic Opinion*[C]// Book and people. Taipei: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Press, 1991: 49-50.
- [5] China Institute founded with second fund[N]. New York Times, 1926-12-19(79).
- [6] China Institute Bulletin[J].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73(3): 13.
- [7] 崔国良.张彭春引领中国戏剧走向世界[N].南开大学学报, 2012-11-23(7).  
CUI Guoliang. Chang Peng-chun introduces Chinese drama to the world [N]. Nankai University News, 2012-11-23(7).
- [8] ATKINSON J B. China's idol actor reveals his art[N]. New York Times, 1930-2-17(27).
- [9] MEI Lanfang. Praises American cordiality[N]. New York Times, 1930-03-23(19).
- [10] Appendices 1.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26 — 1986[M].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86: 62.
- [11] China Institute Bulletin[J].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30(3): 14.
- [12] EUGENE Shen.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M].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31: 7.
- [13] China Institute Bulletin[J].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31(1): 8.
- [14] China Institute Bulletin[J].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55(3): 11.
- [15] 李珊.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对日本战争宣传的反击——以英文撰述为中心[J].抗日战争研究, 2012(4): 64-75.  
LI Shan. The counterattack by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against Japanese propaganda of war after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Focus on English writing[J]. The Journal of Studies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2012(4): 64-75.
- [16] Wiley on behalf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view of China Speak[J].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2(4): 580-587.
- [17] MENG Chih. American contributions to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J]. American Policy in the Pacific,



- 1933(3): 132-138.
- [18] FAIRBANK WILMA. A study of Chinese educational needs[M]. Paris: Report to UNESCO, 1948: 61.
- [19] China presents scholarships to American[N].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1946-09-28(31).
- [20] 肖伊绯. 胡适与周作人的“诗生活” [C]// 民国笑忘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5.
- XIAO Yifei. The poet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 Shih and Zhou Zuoren[C]//Recollections 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2-5.
- [21] 魏宏森. 钱学森与清华大学之情缘[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11): 1873-1882.
- WEI Hongsen. Tsien Hsue-shen and Tsinghua University[J].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8(11): 1873-1882.
- [22] 任思蕴, 周欣平. 赵元任档案: 待开发的宝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访谈录[N]. 文汇报, 2016-06-17(12).
- REN Siyun, ZHOU Xinping. The archives on Chao Yuenren: Treasures to be developed——Interview with the Director of The East Asia Library of the UC Berkeley[N].Shanghai Wenhui Daily, 2016-06-17(12).

## Meng Chih and Sino-US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EN Qi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Meng Chih,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a student leader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one of earliest Chinese exchange students who stud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Sino-US exchanges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60s. Unfortunately, such a vital cultural messenger has long been forgotten by the history. Except occasionally recorded in diaries, essays, memoirs and letters by a few celebrities such as Hu Shi, he almost entirely faded away from academic research. According to Meng Chih's English memoirs published b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some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preserved in China Institute,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other places, in combination with news reports at that tim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his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bridging role of folk culture organizations in bilateral relations.

**Key Words:** Meng Chih;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a-US relationship; cultural exchanges

[编辑: 苏慧]